

略論《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及其史料價值*

郭嘉輝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引言

傅斯年曾言：「史學即史料學。」指出史料的發掘與歷史研究的進步密不可分。民國以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整理、校勘的《明實錄》與內閣大庫中的明清檔案，於明史研究之推進，厥功甚偉。¹回首明史研究，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在位）作為開國君主，創制典章文物，向受學界注視。²可惜因元明之際距今已逾五百餘年，經歷多次戰亂，不少史籍散佚。更不幸的是，賴以為據的《明太祖實錄》初修於建文（1399–1402），卻被成祖（朱棣，1402–1424在位）兩次重修以掩蓋篡位真相。³明初史料的局限，阻礙了重塑洪武一朝（1368–1398）的史事。猶幸踏入二十世紀後半葉，不少學者相繼發掘新史料，彌補既往之不足。尤其陳學霖利用俞本《紀事錄》、太祖敕撰的《紀非錄》、《明太祖皇帝欽錄》，乃至《高麗史》與《朝鮮王朝實錄》的白話詔令，探求歷史真相，不只增加了我們對明初藩王、軍事、宦官與外交等各方面的認識，而且糾正了不少以往的誤解。⁴

* 本文初稿曾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合辦之「第五屆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年10月27–28日）宣讀。承蒙本刊多位匿名評審人不吝賜正，至為感恩。論文修改期間，復蒙業師李金強教授、劉詠聰教授、譚家齊教授給予寶貴意見，謹此再表謝忱。如有缺失遺漏，文責筆者自負。

¹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頁31–36。

² 朱鴻：〈近十年來（1989–2000）有關朱元璋研究之介紹〉，《漢學研究通訊》第77期（2001年2月），頁28–44；朱鴻林（編）：《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v–vi。

³ 謝貴安：《明實錄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34–41。

⁴ 黃秀顏：〈陳學霖教授：學術生平和明史研究簡述〉，《明代研究》第18期（2012年6月），頁1–21。

明太祖所留下的文字作品，為研究洪武朝內政、外交、軍事、社會、經濟及人事的重要史料。⁵遺憾的是，目前相關整理未如理想。⁶太祖的文集匯編《明太祖御製文集》（下稱《御製文集》），迄今只有胡士萼點校整理的《明太祖集》（下稱「萬曆本」）較為全面。⁷胡氏以萬曆十年（1582）姚士觀、沈鈇中都刻本作為底本，參照明初刻三十卷本和嘉靖十四年（1535）徐九皋、王惟賢江都刻本，但似未注意到與《御製文集》

⁵ 見陳學霖：〈明太祖致高麗國王的白話聖旨〉，載陳學霖：《宋明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23；陳高華：〈說朱元璋的詔令〉，載商鴻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編委會（編）：《商鴻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40。

⁶ 目前明太祖的作品整理，可分文集、近人彙編、各類收錄三方面作說明。（一）文集。洪武七年（1374）由樂韶鳳（？-1380）所編的五卷《御製文集》，是最早就太祖作品整理的著作，直到嘉靖、萬曆年間，已有不同的版本刊行面世。逮至清代，萬曆刻本為《四庫全書》所收，成為較為流通的版本。1991年，胡士萼以萬曆本為基礎，參照明初、嘉靖的版本，編成《明太祖集》（合肥：黃山書社），是目前對《御製文集》整理、校勘較全面的成果。至於《御製文集》的各個版本，以及它與《御製集》的源流及關係，後文將作詳述。1992年，由錢伯城、魏同賢、馬樟根主編的《全明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冊出版，共三十四卷，是目前學界對於明太祖各類文字整理最全面的作品。然而陳高華指出，由於《全明文》並未有參照《皇明詔令》、《明太祖皇帝欽錄》、《南京刑部志》、《金陵梵刹志》、《皇明制書》、《高麗史》、《李朝實錄》、《華夷譯語》、《明太祖御筆》及方志、筆記等種種載有太祖文字的史料，故此《全明文》尚可再作增補。（二）近人彙編。1966年，臺灣學生書局將《御製大誥》及其續篇、三篇，以及《臣誠錄》、《存心錄》、《大誥武臣》、《相鑒》、《皇明祖訓》、《祖訓錄》、《賜諸蕃詔敕》、《孝陵詔敕》、《大明官制》、《愍聾觀》等，編為《明朝開國文獻》出版。1995年，張德信與毛佩琦將《御製文集》、《祖訓錄》、《皇明祖訓》、《皇明寶訓》及大誥三篇與《大誥武臣》編成《洪武御製全書》（合肥：黃山書社）。（三）各類收錄。《皇明詔令》、《皇明制書》等明人彙輯詔令亦收錄了不少太祖詔令。參陳高華：〈關於朱元璋文的整理問題——論《全明文》第一冊〉，載《明清論叢》第1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頁99-104；《皇明詔令》，《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1539）傅鳳翔刻二十七年（1548）浙江布政司增修本；張鹵（輯）：《皇明制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七年（1579）張鹵刻本。

⁷ 《御製文集》除了胡士萼的點校本外，只有1965年由臺灣學生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初內府刊本影印出版與《四庫全書》本兩種，但由於《四庫全書》所輯的《御製文集》與胡士萼所據的底本一樣為萬曆十年姚士觀、沈鈇刻本，因此目前只有明初內府刊本與萬曆本兩種版本出版。學界對於《御製文集》各種版本的研究討論亦不多，目前只有包遵彭、胡士萼、萬明三位有所論述。其餘如李晉華《明代敕撰書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2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等亦不過是書目簡介，鮮有考證辨析。見包遵彭：〈明太祖及其文章〉，載《明太祖御製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頁1-9；胡士萼：〈點校後記〉，載《明太祖集》，頁477-80；萬明：〈明代詔令文書研究——以洪武朝為中心的初步考察〉，載《明史研究論叢》第8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頁1-35。

同源的《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下稱《御製集》)。<《御製集》》實際上是明朝(1368–1644)官方所謄錄、重編的文集，輯有大量《御製文集》、《明太祖實錄》所缺的詔令、文書、詩文、歌賦，甚至實錄所據的詔令原稿、白話詔令等，於探討洪武史事極具價值，可惜未受注意。⁸

本文擬從編纂源流、輯錄範圍、詔令與文學作品三方面，說明《御製集》的史料價值，希望拋磚引玉，喚起專家學者注意，以作進一步研究。在討論前，我們且先瞭解為何這麼重要的《御製集》長期遭到忽略。

「御製集」非「御製文集」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共二十一卷，明內府朱絲欄鈔本，每頁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現存十九卷，按目錄所載有：詔、敕、制、檄、賜書、誥命、敕命、樂章、祝文、祭文、碑(誌傳附)、記、序、論、說、文、贊、策問、雜著、題跋、古樂府、歌、詞、賦、四言古、五言古、七言言、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七言律、七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共三十四項，現分別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故宮所藏為十八卷本，缺第十四、十五、十九合共三卷，分為十九冊，合共726頁，目錄38頁，卷一34頁，卷二35頁，卷三52頁，卷四40頁，卷五30頁，卷六46頁，卷七66頁，卷八31頁，卷九20頁，卷十14頁，卷十一63頁，卷十二40頁，卷十三39頁，卷十六32頁，卷十七24頁，卷十八34頁，卷二十45頁，卷二十一43頁。據目錄所示，該本缺論、說、文、贊、策問、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八種。國圖則只藏有第十五卷，載文、贊、策問三種。⁹本文所據版本為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¹⁰該膠片根據原藏於國立北平圖書館的殘存十八卷攝製，與故宮藏本相同。

中國大陸2009年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堪稱目前中文古籍的總目錄，¹¹其書著錄八類明太祖文集：(一)《御製文集三十卷》；(二)《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三)《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附訓行錄》；(四)《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祖訓一卷》；(五)《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一卷》；(六)《吳文定公手鈔明太祖文不分卷》；(七)

⁸ 就目前所知，吳緝華是最早利用《御製集》的詔令研究明初史事的學者。然而吳氏以外，鮮見他人引用。見吳緝華：〈明代建國對外的基本態度及決策〉，《東方文化》第6卷第1、2期(1978年)，頁184–93。

⁹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頁2302。

¹⁰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據北平圖書館藏明內府朱絲欄鈔本攝製膠片卷687–88。

¹¹ 吳格：〈《中國古籍總目》編纂述略〉，《中國索引》2010年第2期，頁32–36。

《明太祖文集二十卷》；(八)《明太祖御製文集一卷》，共計十三種，其中十種為刻本，三種為抄本，大多於明初、嘉靖(1522–1566)、萬曆(1573–1620)刊刻。¹²撇除《吳文定公手鈔明太祖文不分卷》與《明太祖御製文集一卷》清紅格抄本等較為畸零的版本外，現存的《明太祖御製文集》分為二十卷本和三十卷本，這與焦竑(1540–1620)《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1629–1691)《千頃堂書目》的記載相符，稱這兩類為《御製文集》的主要版本應無爭議，¹³但這一點卻衍生不少值得考慮的問題。首先二十一卷的《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應否歸類為《御製文集》？若是，則應屬於二十卷類或是三十卷類？筆者檢索臺北國家圖書館編製的「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及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網上資料，發現兩者均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記為《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而非《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這樣一來，二十一卷本就是《御製集》而非《御製文集》。但奇怪的是，「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卻又將故宮所藏殘存十八卷本記為《大明太祖皇帝御製文集》而非《御製集》。然而，若登記為《御製文集》，則理應編入《中國古籍總目》中，但總目卻未見記載。同一套《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分藏於臺灣、大

¹² 茲就各種主要善本書目對《御製集》的著錄作一簡單說明。首先，臺灣方面，1969年包遵彭將美國國會圖書館運回的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編成《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將《御製集》記為《大明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其時已有一字之差。後來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灣國家圖書館編製的「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亦沿襲此誤。中國大陸方面，1983年王重民的《中國善本書提要》只錄及三種《御製文集》，並未著錄《御製集》。其後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雖提到十種《御製文集》，但並未著錄《御製集》。崔建英在這基礎上編的《明別集版本志》，因而未有提及《御製集》。直至2009年的《中國古籍總目》才將《御製集》收錄，但所登記的版本為只有第十五卷的一卷本，而且記為《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這一版本最先見載於1989年所編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稱為《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製集》。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卷本並未見於民國時期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善本書目，直至近代才突然出現，因此估計應為近人輯遺所發現。明代史料的參考工具書方面，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所編的《明代史籍彙考》只記諸本《御製文集》，並未提及《御製集》。見包遵彭：《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年)，頁196；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年增訂二版)，頁996；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556–57；翁連溪(編校)：《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頁1363；崔建英(輯訂)：《明別集版本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53–55；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頁2302；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集部第2冊，頁537–38；Wolfgang Franke, *Annotated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Including Southern Ming and Works on Neighbouring Lands, 1368–1661*,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Liew-Herres Foon Ming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11), pp. 616–17。

¹³ 焦竑：《國史經籍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卷一，頁1；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十七《別集類》，頁441。

陸，卻分別記為《御製集》、《御製文集》；又有登記為《御製文集》者，卻又未見於總目，實在費解。由此可見，《御製集》與《御製文集》因一字之差，經常造成混淆，以至各目錄出現失載、誤載的情況，同時亦使人難以區別，這應是造成《御製集》長期被忽略的主要原因。

然而這種混淆、誤解實並非一時之誤，而是學界長期以來未釐清概念。早於1932年，李晉華《明代敕撰書考》將「北平圖書館有明內府鈔本一部」（即《御製集》）列在「太祖文集二十卷」之下，與楊起元、姚士觀等萬曆本《御製文集》同列，混淆了《御製集》與《御製文集》。¹⁴ 其後臺灣學生書局於1965年刊印《御製文集》的明初內府刊本（下稱「明初本」）時，附載包遵彭撰序文〈明太祖及其文章〉，就《御製文集》的不同版本作出分析，並說明各本的史料價值。包氏於文中雖然注意到「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內府鈔本一部」即《御製集》，¹⁵ 但沒有分辨出此本與其他《御製文集》有何不同。雖然如此，包遵彭提到一點非常重要：「這一內府鈔本，由何人編輯，在何時謄錄，近代版本學家，迄少論及。」¹⁶ 包氏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深於古籍，亦斷言此本的研究、關注甚少。¹⁷ 是故《御製集》一直乏人問津，亦鮮有將《御製集》與《御製文集》加以區別，學者甚至往往誤以為《御製文集》與《御製集》實同一書。

另一方面，若仔細翻檢《中國古籍總目》，可以發現《御製集》並非孤例。現存的《大明太宗皇帝御製集》¹⁸、《大明仁宗皇帝御製集》¹⁹、《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²⁰ 三種，與《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一樣，都是明內府鈔本。因此可以斷言，《御製集》為明朝內府所編輯的一類書籍，不應與《御製文集》混為一談。爬梳《御製集》的編纂源流即能印證此說。

¹⁴ 李晉華：《明代敕撰書考附引得》，頁23–25。李氏於文中引劉基後序謂「御製文集十五卷，論；記；詔；序；詩；文凡若平篇」，但檢《高皇帝御製文集》（明嘉靖十四年徐九皋江都刊本）所載的劉基後序，則為「御製文集五卷」，李氏顯有筆誤。參劉基：〈御製文集後序〉，載《高皇帝御製文集》，〈後序〉，頁一上。

¹⁵ 按文中所記的這一部內府寫本，「原標二十一卷，工筆楷書，每頁十行，每行二十二字，裝璜精緻」，並配合前述為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這些描述與現存版本相同，故可肯定包氏所指的內府寫本為《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製集》。見包遵彭：〈明太祖及其文章〉，頁3–4。

¹⁶ 包遵彭：〈明太祖及其文章〉，頁4。

¹⁷ 包趙瑛階：〈逝者已矣〉，上篇，《傳記文學》第22卷第1期（1973年1月），頁76–84；下篇，《傳記文學》第22卷第2期（1973年3月），頁92–100；張錦郎：〈包遵彭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16卷第1期（1983年4月），頁42–47。

¹⁸ 明成祖：《大明太宗皇帝御製集》，《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據，2000年）影印故宮明內府寫本。

¹⁹ 《大明仁宗皇帝御製集》殘存目錄二卷，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參翁連溪：《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頁1376。

²⁰ 明宣宗：《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內府鈔本。

源流去向

明廷的藏書紀錄，最早且較重要者為楊士奇（1364–1444）正統六年（1441）編成的《文淵閣書目》。當中雖有提及《御製文集》，但卻未見關於《御製集》的記載。這反映兩種可能：（一）《御製集》於正統（1436–1449）以後才開始編集；（二）《御製集》編成以後，並不藏於文淵閣內。下文先從它的藏地追查。

關於《御製集》的藏地，各種明代書目題跋之中，只見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張萱所編的《內閣藏書目錄》：「重定文集目錄：太祖高皇帝御製集目錄也，鈔本」及「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二冊全·鈔本。」²¹雖然只提到有所謂《御製集》目錄，已足以證明《御製集》於萬曆時期（1573–1620）已經存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陳于陞（1545–1596）奏議重修「國史」，由萬曆二十二年（1594）開館至二十五年（1597）止，歷時兩年十個月，成果豐碩。²²焦竑因受命編史而著有《國史經籍志》六卷，更可視為編修「國史」的成果。但翻檢該書目，卻未見著錄《御製集》。²³《內閣藏書目錄》與《國史經籍志》都是萬曆時期的重要書目，但為何只見《內閣藏書目錄》記載？未免令人費解，唯一可作解釋的是，《御製集》最遲於萬曆時期已經問世，然而並不流通。

既然《內閣藏書目錄》指《御製集》為「重定文集目錄」，可以斷言《御製集》與《御製文集》的重編工作有密切關係，因此有必要把《御製文集》的重編歷程梳理清楚。

明太祖的文集最早於洪武七年（1374）由翰林學士樂韶鳳編成，有論、記、詔、序、詩、文六類，共五卷。²⁴按宋濂（1310–1381）後序所記，編成後又有「後集」。²⁵宋濂於〈恭題御賜文集後〉提及該文集僅三帙，而且一直藏於禁中，只於洪武八年（1375）賜予李善長（1314–1390）、胡惟庸（？–1380）、宋濂三人，其流通之低可想而知。²⁶永樂元年（1402），明成祖讀《御製文集》後，以「朕於宮中徧尋皇考宸翰不可得」為由，令禮部派監生三十餘人前往各地布政司、府、州、縣令搜集太祖詩文。²⁷永樂七年（1409）六月，黃淮（1367–1449）與楊士奇完成《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及《洪武實錄》的點檢，代表著《明太祖實錄》的二修與《御製文集》的重編同時完成。時間上

²¹ 張萱：《內閣藏書目錄》，收入馮惠民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464、466。

²² 李小林：《萬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40。

²³ 李小林：〈淺論明朝本朝史的編纂〉，載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編）：《明清史論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81–90；《國史經籍志》，卷一，頁1。

²⁴ 劉基：〈御製文集後序〉，頁一上。

²⁵ 宋濂：〈御製文集後〉，載《高皇帝御製文集》，〈後序〉，頁四上。

²⁶ 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翰苑別集〉，卷二〈恭題御製文集後〉，頁990。

²⁷ 張輔等：《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二六，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條，頁483–84。

的巧合，反映成祖為了消滅篡位證據，不惜竄改文集內容。《御製集》與《明太祖實錄》都收錄了〈諭燕王敕〉中竄改楊文、郭英（1335–1403）及遼王（朱植，1377–1424）聽燕王節制的內容，²⁸這是永樂朝重編的鐵證。

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世宗（朱厚燧，1521–1567在位）藉完成重書「訓錄」的機會，命郭維藩（1475–1537）為管錄官，²⁹率官生將「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等及四書、五經、二十一史、性理大全、聖學心法」，謄寫一部以作貯藏，同時又命製「書、經、史」的刊版一副。³⁰嘉靖十五年（1536）八月，又命吏部左侍郎溫仁和主理，嚴嵩（1480–1567）與史官負責「重書《御製集》及經籍書」。³¹嘉靖二十二年（1543）五月，「累朝御製文集、聖學心法及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纂輯謄寫完成。³²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皇祖列聖御製文集」、「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及「二十一史」等謄錄告竣，至此《御製文集》重錄完成。³³值得注意的是，嘉靖朝的重編工作包括「累朝御製文集」，而現存《御製集》除明太祖外，亦有成祖、仁宗、宣宗三種，與記載吻合。因此，《御製集》的出現很大可能與嘉靖朝重編相關。再者，嘉靖朝參與重編者陣容龐大，除了上述郭維藩、溫仁和、嚴嵩外，還有呂本（1504–1587）及劉銓等國史檢討、校錄官，故不難推論其所輯之《御製集》應更為完備。³⁴

萬曆二年（1575）十月，神宗（朱翊鈞，1573–1620在位）問及建文史事，命張居正（1525–1582）謹錄「聖祖皇陵碑及御製文集」進覽。³⁵萬曆十六年（1588）二月，申時行（1535–1614）呈進《御製文集》及《明太祖實錄》，同時又注意到「藏經閣」的七十六道明太祖御筆。³⁶迨至萬曆二十一年（1593），又因纂修「國史」的緣故，再次提及《御

²⁸ 黃彰健：〈讀明刊毓慶勳懿集所載明太祖與武定侯郭英敕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1962年），下冊，頁617–25；《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四，頁八上至八下。

²⁹ 「纂修列聖御製文集充管錄官擢今官至是卒。」見張居正等：《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二百六，嘉靖十六年十一月己卯條，頁4298。

³⁰ 《明世宗實錄》，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乙卯條，頁3951。

³¹ 同上注，卷一百九十，嘉靖十五年八月丁未條，頁4013。

³² 同上注，卷二七四，嘉靖二十二年五月丁卯條，頁5380。

³³ 同上注，卷二九四，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乙巳條，頁5626。

³⁴ 焦竑：《國朝獻徵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徐象榘曼山館刻本，卷十六〈內閣五·太傅呂文安公本傳〉，頁589；卷二二〈翰林院三·資善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西橋劉公銓墓誌銘〉，頁195；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1638）吳一璘刻本，卷十五，頁654–60。

³⁵ 溫體仁等：《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三十，萬曆二年十月戊午條，頁728–29。

³⁶ 同上注，卷一九五，萬曆十六年二月戊寅條，頁3679–80。

製文集》。³⁷只是自此以後，《明神宗實錄》未再有記載。幸虧曹于汴(1558–1634)的《仰節堂集》收錄萬曆三十四年(1606)的〈擬史臣欽承上命重錄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進呈表〉。³⁸從表的內容可知，萬曆朝《御製文集》的重錄最晚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完成。不過，目前《明太祖御筆》所載的七十四道詩文，³⁹並未輯進今本《御製集》中，這不免令人懷疑為何萬曆朝重錄並不將這些詩文輯入。從這一點來看，萬曆朝重錄似乎於《御製集》的內容實質影響不大。

簡而言之，明太祖的《御製文集》初編於洪武七年(1374)，繼於永樂、嘉靖、萬曆三朝重錄或重新編集，在流傳過程中衍生出《御製集》。⁴⁰檢《御製集》編目，與今存《御製文集》明初本⁴¹、嘉靖本⁴²、萬曆本⁴³均大相徑庭。嘉靖本刻於嘉靖十四年，實又早於嘉靖朝的重編，這便說明了《御製集》與嘉靖本《御製文集》的編纂並無關係，彼此分途進行。關於這點，《御製文集》嘉靖本中徐九皋的〈後序〉有清楚說明。

〈後序〉首先提及：「翰林學士樂韶鳳等輯高皇帝詩文五卷，近滇南刻本二十卷，目不與韶鳳等輯同。」⁴⁴這說明了徐氏所據聞人詮滇本與洪武本並不相同，這又可能是永樂的重編本或是更早的版本。此一推論，礙於史籍失載，難以確證。然而嘉靖本的底本並不是洪武本，卻可斷言。此外，〈後序〉又提到：「臣〔徐九皋〕乃檄江都知縣臣王惟賢刻焉。惟賢復搆得甲、乙、丙、丁四集，間多前集所未登錄。蓋當時侍從文學之臣，各自纂記，以故篇次不倫。臣乃躬自讐校，互相補除，合六百七十二篇，仍分為二十卷第錄。」⁴⁵可見嘉靖本增補的史料，來自王惟賢在坊間所收集《御製文集》的甲、乙、丙、丁四集，這與《御製集》內廷重編的情況不一。因而可以肯定，自此以後，《御製文集》與《御製集》分道揚鑣。再者，胡士萼的考證指出，萬

³⁷ 同上注，卷二六四，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乙卯條，頁4896–4901。

³⁸ 曹于汴：《仰節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十〈策問〉，頁793–94。

³⁹ 索予明：〈明太祖御筆釋例〉，《故宮季刊》第2卷第1期(1967年7月)，頁31–58；索予明：〈明太祖御筆釋例續篇〉，《故宮季刊》第2卷第3期(1968年1月)，頁49–71。

⁴⁰ 包遵彭於〈明太祖及其文章〉一文頁5，只引《國權》載萬曆二年(1574)張居正謹錄「聖祖皇陵碑及御製文集」一條，而推論《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為萬曆年間寫本，並說「此為明代史書中有關朝廷謄錄太祖文集之僅有著錄」，忽視了永樂、嘉靖兩朝的謄錄情況。

⁴¹ 《明太祖御製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

⁴² 《高皇帝御製文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1535)徐九皋江都刊本攝製膠片卷980。

⁴³ 考慮到胡士萼點校本的字詞與諸本不一，如諸本《御製文集》中所記的「於戲」多改為「嗚呼」等等，本文於對校「萬曆本」時，亦參考《四庫全書》本。稍應注意的是，四庫本缺〈皇陵碑〉，而且就人名的譯名亦不一。見朱元璋(撰)、胡士萼(點校)：《明太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明太祖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⁴⁴ 《高皇帝御製文集》，〈後序〉，頁六上。

⁴⁵ 同上注，頁六上至六下。

曆本不過是在嘉靖本的基礎上作補充。⁴⁶因此，嘉靖本與萬曆本應屬同一系統。所以《御製集》與《御製文集》顯然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不可混為一談。

至此，《御製集》與《御製文集》的區別非常清楚，兩者雖然均源出於《御製文集》的洪武本，但《御製集》一直為內廷重錄，《御製文集》則為各地的續輯，兩者最遲於嘉靖時期出現重大差別。值得注意的是，《御製集》因係內廷輯錄，其史料價值遠高於《御製文集》。

史料價值

《御製集》與《御製文集》雖然同源，但隨著不同時期由內府或是各地重編輯錄，使得兩者無論在編目上還是在內容上已經相去甚遠，那麼《御製集》又有甚麼價值可言？這部份將從編集範圍、詔令文書的原始性及文學作品三方面作一討論。

首先，從輯錄範圍而論。由於《御製文集》與《御製集》皆由編集、重錄而成，因應不同的主事者，輯錄內容亦不盡相同。從編目而論，《御製文集》的明初本分為詔、制、誥、書敕、敕、敕命、策問、敕問、論、樂章、祝文、樂歌、文、碑、記、序、說、雜著、祭文十九項，嘉靖本加入古詩、歌行、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七言絕句六項，刪除祝文一項，合共二十四項。萬曆本在此基礎上，將誥分拆為誥與誥命，再加入五言絕句，共有二十六項。總之，明初本、嘉靖本與萬曆本三本的編排次序如出一轍，不同之處在於嘉靖本開始輯入詩、歌、排律、律詩與絕句等文學作品。就整體布局而論，《御製文集》與《御製集》頗為不同。《御製集》目錄所載共有三十四項，比《御製文集》的萬曆本多出八項，這不單代表了《御製集》輯錄的範圍比《御製文集》更廣，亦反映了《御製集》的分類更為仔細。

從類目上所見，《御製集》與明初本一樣，皆設有祝文一項，與嘉靖本、萬曆本不同。此外，檄、贊、題跋、古樂府、詞、賦、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七言律、七言排律，合共十一項，皆為《御製文集》所無。必須注意的是，《御製文集》並非沒有相關的內容，只是以「雜著」作籠統的包涵而已。如以萬曆本為例，其「雜著」共收五十五篇作品，其中二十九篇在《御製集》歸入「贊」，八篇「題跋」，四篇「賦」，一首「詞」，一篇「誌」，餘下十二篇為「雜著」。此外「歌行」所載有三首於《御製集》被目為「七言古」，「古詩」十三首又可分屬為「五言古」及「七言古」。剔除以後，《御製集》獨有的項目有「檄」、「古樂府」、「四言古」、「七言律」、「七言排律」五項，其中四項與文學作品相關，這一點反映出《御製集》對於研究明太祖的文學修養，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再者，《御製集》將「雜著」的內容按類細分，並且陸續輯入更多的作品，這反映了《御製集》對太祖文學作的整理、收集遠勝於《御製文集》。這一點我們從以下的統計表也可得知。

除了編目外，《御製集》所輯太祖作品的數量遠超於《御製文集》的各個版本，這亦是《御製集》不容忽視的原因，從表一可見：

⁴⁶ 胡士萼：〈點校後記〉，頁478-79。

表一：《御製集》與《御製文集》（明初本、嘉靖本、萬曆本）目錄統計表⁴⁷

	分類	《御製集》	明初本	嘉靖本	萬曆本
1	詔 ⁴⁸	98	40	43	43
2	敕	302	136 ⁴⁹	158 ⁵⁰	159 ⁵¹
3	制	5	2	2	2
4	檄	3	缺		
5	賜書	66	6	6	6
6	誥命	86	52	54 ⁵²	54 ⁵³
7	敕命	35	22 ⁵⁴	22 ⁵⁵	22 ⁵⁶
8	樂章	5	5	5	5
9	祝文	28	21	22	22
10	祭文	81	30	31	32
11	碑（誌傳附）	4	2 ⁵⁷	2 ⁵⁸	2 ⁵⁹
12	記	15	8	12	12
13	序	32	2	12	12
14	論	17	11	17	17
15	說	30	13	28	30

⁴⁷ 由於《御製集》十四、十九兩卷已經散佚，不能從內容上作全面的類比統計。不足的部份只能依據目錄。為了便於統計，各《御製文集》的分類皆以《御製集》為準。

⁴⁸ 各個版本《御製文集》所收錄的〈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於《御製集》列入「敕」，故統計上並不列入「詔」。值得一提的是，《御製文集》所載的內容比《御製集》豐富。

⁴⁹ 共一百三十七篇，但由於「敕問」中的〈問佛仙〉於《御製集》列入「敕」，故列入計算，同時亦加上〈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另一方面，〈神樂觀提點敕〉、〈神樂觀知觀敕〉、〈建昌僧官敕〉於《御製集》列為「敕命」而非「敕」，故又減去三篇。

⁵⁰ 共一百五十八篇，增減情況與明初本相同，唯比明初本多出一篇〈問佛仙〉。

⁵¹ 共一百五十九篇，增減情況與嘉靖本相同。

⁵² 「誥」三十三篇，「誥命」二十二篇，合計五十五篇。但由於〈曲阜縣知縣孔克瑩敕〉於《御製集》列為「敕」，需減去一篇。

⁵³ 情況與嘉靖本相同。

⁵⁴ 原有十八篇，但由於《御製集》將〈曲阜縣知縣孔克瑩敕〉、〈神樂觀提點敕〉、〈神樂觀知觀敕〉、〈建昌僧官敕文〉列作「敕命」，故加上此四篇。

⁵⁵ 情況與明初本相同。

⁵⁶ 同上注。

⁵⁷ 「雜著」中的〈永嘉侯朱亮祖壙誌〉在《御製集》中列入「碑（誌傳附）」。

⁵⁸ 情況與明初本相同。

⁵⁹ 同上注。

	分類	《御製集》	明初本	嘉靖本	萬曆本
16	文	12	11	14	14
17	贊	33	13 ⁶⁰	26	26
18	策問	23	16 ⁶¹	19 ⁶²	19 ⁶³
19	雜著	19	6	12	12
20	題跋	9	2 ⁶⁴	8 ⁶⁵	8 ⁶⁶
21	古樂府	17	缺		
22	歌	26	0	4 ⁶⁷	4 ⁶⁸
23	詞	8	0	1 ⁶⁹	1 ⁷⁰
24	賦	7	0	3 ⁷¹	4 ⁷²
25	四言古	8	缺		
26	五言古	71	0	12 ⁷³	12 ⁷⁴
27	七言古	34	0	4 ⁷⁵	4 ⁷⁶
28	五言律詩	27	0	2	3
29	五言排律	4	0	1	1
30	七言律詩	193	0	20	46

⁶⁰ 「雜著」中的〈嘉瓜贊〉、〈神龍效靈贊(並序)〉、〈烏龍贊〉、〈所翁九龍圖贊〉、〈海龍圖贊〉、〈唐太宗出獵圖贊〉、〈毗沙門天王贊〉、〈佛母贊〉、〈華藏世界贊〉、〈瑞光塔贊〉、〈老子贊〉、〈龍虎山二十代天師贊〉、〈天王圖贊〉共十三篇於《御製集》列入「贊」。

⁶¹ 共六篇，因〈敕問文學之士十篇〉在《御製集》中屬於「策問」，故列入計算。

⁶² 共六篇，因〈敕問文學之士十三篇〉在《御製集》中屬於「策問」，故列入計算。

⁶³ 情況與嘉靖本相同。

⁶⁴ 「雜著」中的〈題徐熙春著暮雪雙禽圖〉及〈題李嵩西湖圖〉在《御製集》中列入「題跋」。

⁶⁵ 「雜著」中的〈跋夏珪長江萬里圖〉等八項在《御製集》中列入「題跋」。

⁶⁶ 情況與嘉靖本相同。

⁶⁷ 題為「樂歌」。〈大祀文并歌九章〉於《御製集》列入「文」類，故餘三首，再合計「歌行」中的〈廢僧錫仗歌〉，共四首。

⁶⁸ 情況與嘉靖本相同。

⁶⁹ 「雜著」中〈秋水辭詠無智〉在《御製集》中列入「詞」。

⁷⁰ 情況與嘉靖本相同。

⁷¹ 「雜著」中的〈鶯囀皇州賦〉、〈畫眉賦〉、〈四瀆潦水賦〉在《御製集》中列入「賦」。

⁷² 「雜著」中的〈鶯囀皇州賦〉、〈畫眉賦〉、〈四瀆潦水賦〉在《御製集》中列入「賦」。此外，「雜著」中有〈江流賦〉，不見於《御製集》中，姑且列為「賦」類。

⁷³ 題為「古詩」，於《御製集》中全列為「五言古」。

⁷⁴ 情況與嘉靖本相同。

⁷⁵ 於《御製文集》題為「歌行」，共三首，再加上「古詩」中的〈咏李白短歌行〉。

⁷⁶ 情況與嘉靖本相同。

	分類	《御製集》	明初本	嘉靖本	萬曆本
31	七言律	197		缺	
32	七言排律	1		缺	
33	五言絕句	24	0	0	1
34	七言絕句	250	0	72	57

經過以上的比較，《御製集》的重要性便一目瞭然。三十四類的輯錄，無一比諸本《御製文集》少。⁷⁷文學作品上，除了獨有欄目、明細分類外，《御製集》的數量更遠非《御製文集》可比，單是「七言律詩」已超出萬曆本四倍有多，「七言絕句」亦達三倍多，遑論其他部份。《御製集》對於研究明太祖的文學修養、思想、心理的獨特價值，顯然易見。此外，詔、誥、制、敕、諭等各種格式的政令文書，更為學者探討明代政治的必備史料。⁷⁸綜觀上表，單是「詔」、「敕」、「救命」三項，已超出萬曆本近倍，從這一簡表可見《御製集》在討論洪武朝政治上的作用。

從編目、數量上分析《御製集》的輯錄範圍，皆見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特別是在政治、文學等範疇上。掌握概況後，現在可以作更細緻的分析與討論。

在詔令文書方面，正如表一所示，《御製集》所載詔、誥、制、敕、諭的數量眾多，同時又有《御製文集》所缺的「檄」。單從這些表徵，《御製集》已比《御製文集》優勝。然而數量多不一定代表質量較佳，故此這一部份將以《御製集》的「詔」為例分析。因為「詔」是皇帝發表的正式文告，又是最常用的政令文書，更加是當中最重要格式，以此為例便有足夠的代表性。⁷⁹《御製集》卷一、卷二合共收錄「詔」九十八篇。對照《明太祖實錄》，有二十二篇為實錄所缺，其中七篇見載於《御製文集》的嘉靖本與萬曆本。此外，〈賜湖州德清縣舉人王瑱之父詔〉見載於《水東日記摘抄》，⁸⁰

⁷⁷ 經過對比編目，可知《御製集》所載史料的數量顯然是各本《御製文集》所不及。雖然如此，仔細對比下，《御製文集》仍有個別作品為《御製集》所缺。〈真人張宇初誥文〉與〈問高麗貢不如約〉、〈諭安南國王阮廷檜省親敕〉兩篇救命皆見載於明初、嘉靖、萬曆三種版本而不見於《御製集》。此外，《御製集》中所載〈諭靖江王府文武官敕〉於各本《御製文集》記為〈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尤以文集所記為詳細。除了以上三篇缺載於各種版本外，嘉靖本與萬曆本所載〈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敕〉一篇與〈僧道竺隱說〉皆為《御製集》所無。此外，相較各本《御製文集》，萬曆本載有較多《御製集》所缺的文章，「救命」有〈賜平涼縣尹王軫父諭〉，「說」有〈解夷狄有章說〉與〈解攻乎異端章說〉，「賦」有〈江流賦〉，「五言律詩」有〈題扇示胡日星〉，「七言律詩」有〈早行〉、〈新月〉、〈賜都督僉事楊文慶征南〉、〈接機〉，「五言絕句」有〈咏雪竹〉，「七言絕句」有〈咏菊花〉、〈示僧謙牧〉、〈征陳至瀟湘〉、〈不惹菴示僧〉、〈咏虹霓〉、〈采石磯新秋月色〉、〈贈劉伯溫〉。

⁷⁸ 陳時龍：〈明代詔令的類型及舉例〉，載《明史研究論叢》第8輯，頁130-51。

⁷⁹ 同上注，頁131-33。

⁸⁰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一〈賜湖州德清縣舉人王瑱之父詔〉，頁三三上至三四上；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十一〈記王軫父家書事〉，頁115-17。

〈諭平緬詔〉見載於《雲南機務抄黃》，⁸¹〈命善世禪師都綱詔〉又為《金陵梵刹志》收錄。⁸²其餘則為罕見的詔令。其中〈諭迤北達達紅羅山晉王斡耳朵女直等詔〉與〈諭朵甘烏思藏等處詔〉，更是罕有的白話詔令，單從這幾點便可知道《御製集》具有獨特價值。《御製集》的詔令除了罕見外，還有甚麼其他價值？以下試詳細分析。

首先從白話詔令說起。《御製集》除了輯錄上述兩篇外，最特別在於收入洪武三年(1370)六月的〈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鎖里爪哇等詔〉。⁸³該詔同樣為《明太祖實錄》收錄，⁸⁴但實錄所載為經過文字潤色後的版本，並不是《御製集》所載的白話。茲將兩者對比如下：

《御製集》	《明太祖實錄》
<p>自古來做皇帝的整治天下呵，但是日頭月兒照著的地面，不問遠處近處都一般看待。因此上，中國裏得安寧，四壁廂外國裏也都得安寧了。似這般行的上頭，遠處的國土都自然歸附來。在後到元朝，因著妥歡帖木兒皇帝荒淫昏弱，不整理天下大勾當，天下都亂了，眾人把元朝地面十分裏奪占了九分，卻行不出愛百姓的好勾當。因此上，見百姓每受苦的上頭，我領著軍馬起來，把眾人占奪了元朝地面的都平定了，官人每、軍人每、百姓每，推尊我大位子裏做了皇帝，與天下做主，國號喚做大明，年號喚做洪武。前年把元朝大都得了，中原地面都混一了。占城、安南、高麗都來朝貢了。今年五月，俺總兵官軍馬到應昌府，知道妥歡帖木兒皇帝於四月二十八日痢疾死了，他的孫兒買的里八剌并寶冊后妃，俺將軍每都將來了。我想著買的里八剌是薛禪皇帝根腳，與他重名分了。如今我依著古來做皇帝的法度，整理天下大勾當，正要教您遠處近處的百姓都一般受用，這天與的太平福分。有想著您遠處國土裏，這幾年信息不通，您王子每、頭目每、百姓每，不知道的上頭，如今著詔書諭恁知道。</p>	<p>自古為天下主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若遠若近，生人之類，無不欲其安土而樂生。然必中國治安，而後四方外國來附。近者，元君妥歡帖木兒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傑割據郡縣，十去八九。朕憫生民之塗炭，興舉義兵，攘除亂略。天下兵民，尊朕居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麗諸國俱已朝貢。今年遣將巡行北邊，始知元君已歿，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為崇禮侯。朕做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咸樂其所，又慮汝等僻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知。</p>

⁸¹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二〈諭平緬詔〉，頁二十七下至二十八上；《雲南機務抄黃》，《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紀錄彙編》本，頁22-23。

⁸²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二〈命善世禪師都綱詔〉，頁三五上至三五下；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民國二十五年(1936)金山江天寺影印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南京僧錄司刻天啟增修本，卷一〈御製集〉，頁720。

⁸³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二，頁十九上至十九下。

⁸⁴ 實錄題為〈詔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爪哇畏吾兒等國〉。見夏原吉等：《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戊寅條，頁1049-50。

兩相比照，可知無論《御製集》的白話或是實錄的文言，所述內容相去不遠。大意指元朝因順帝昏淫而失天下，朱元璋起兵，削平群雄，即位為太祖，國號大明，年元洪武。占城、安南、高麗諸國亦已入貢。太祖遣將巡邊，得知元順帝病逝，獲其孫買的里八剌(1362-?)，封為崇禮侯。遣使往諭各國，使咸知此事。將同一詔令的白話、文言兩種版本相互對比，不只有助於我們掌握實錄在編纂過程中，文臣如何進行潤色，也有助於我們瞭解其時的白話應用。

再者，這白話詔令題為〈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鎖里爪哇等詔〉，其頒布的對象包括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與爪哇。檢《諸司職掌》，西洋瑣里、爪哇均屬「蕃國」。⁸⁵所以《御製集》的這篇詔令便佐證了白話詔令為明代外交詔令的說法。⁸⁶此外，《御製集》輯有〈諭迤北達達紅羅山晉王幹耳朵女直等詔〉與〈諭朵甘烏思藏等處詔〉，以及白話誥文〈畢里千戶誥〉⁸⁷等等，皆可反映白話詔令文書的應用範圍，這些都對我們瞭解明初與少數民族、域外政權的往來情況大有裨益。

除了白話詔令外，《御製集》詔令的原始性亦值得關注。《御製集》載有不少實錄所缺的詔令，其中冊立、任命一類更可補史料之缺。《御製集》所載的〈立皇太孫詔〉、〈命汪廣洋為右丞相詔〉、〈命右軍左都督甯政等鎮雲南詔〉等詔，⁸⁸即為他本所無。雖然三詔所載亦見於實錄，但實錄只濃縮成一句，未有照錄詔書。⁸⁹實錄雖記錄事件，但卻忽略了任命、冊封的隱含意義。以〈命汪廣洋為右丞相詔〉為例，詔曰：「朕聞自周至今，凡有天下創業之君，其間能保全功臣，使得安養而自老者，惟漢之光武，世稱之。……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侍朕以來，朝寅而至，暮戌而歸，今十有八年，勤勞多矣。朕見年高，驅馳侍立，心懷不忍，三載于茲。近因其上表告以致政。朕已許之，使遂其志，亦功名兩全，漢之何參過於此乎。」⁹⁰詔中所載與太祖屠戮功臣的形象頗有不同。雖然此詔早於洪武四年(1371)時頒布，但內容透露太祖想法的變化，可補實錄記載之不足。此外，〈命右軍左都督甯政等鎮雲南詔〉提及甯正

⁸⁵ 《諸司職掌》，收入古典研究會(編)：《皇明制書》(東京：古典研究會，1966-67年)，卷四，頁325。

⁸⁶ 這說法萬明在〈明太祖外交詔令考略〉一文提出，而陳學霖於〈明太祖於高麗國王的白話聖旨〉頁249-50則予以反駁，指白話詔令只見於《高麗史》、《李朝太祖實錄》等韓國史籍，「未見宣諭於其他藩國，如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羅斛、真臘等等」，難以推論白話詔令於外交詔令的重要性，但由此可見白話詔令似乎有遍及蕃國的跡象。

⁸⁷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八，頁二五下至二六上。

⁸⁸ 同上注，卷一，頁十三上至十四上、二三下至二四下、二九下至三十上。

⁸⁹ 「立皇太孫」一項於《明太祖實錄》只載「庚寅，冊立皇第三孫允炆為皇太孫，祭告太廟」；而命汪廣洋為右丞相則只記「以中書右丞忠勤伯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甯政」於實錄記為「甯正」，亦但云：「庚寅，以雲南都指揮使甯正為右軍都督府左都督命鎮守雲南。」見《明太祖實錄》，卷六十，洪武四年正月丙戌條，頁1167；卷二一九，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寅條，頁3215；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庚寅條，頁3233。

⁹⁰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一〈命汪廣洋為右丞相詔〉，頁二三下至二四下。

以外，尚有前軍都督何福與中軍僉都督徐司馬一同前赴鎮守雲南。⁹¹故此，利用《御製集》詔令對照《明太祖實錄》的記錄，的確能為我們提供更多訊息。類似詔令《御製集》甚多，以上不過其中三例而已。⁹²

然而《御製集》的價值並不止於此。上文指出《御製集》詔令記載比實錄詳細，這一點正反映了《御製集》所輯的詔令文書應有不少是早於實錄纂修的原始史料。這一點更可從比對《御製集》與《明太祖實錄》的詔令得知。不過兩書篇目相同的詔令共有七十六篇之多，若全盤進行比較，實非本文篇幅所能涵蓋。故此，以下將以〈諭元臣納哈出詔〉為例說明。⁹³因為〈諭元臣納哈出詔〉只載於《御製集》而不見於《御製文集》，有獨特的對比意義。洪武三年（1370）五月，太祖遣使頒詔納哈出（?-1388）：

《御製集》	《明太祖實錄》
<p>曩因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群雄角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眾，自淮渡江，姑孰之捷，爾寔在焉。時朕未知天命，而無必天下之心。凡遇元臣之忠於所事者，未嘗不嘆其勞，而惜其無成。爾與張御史之歸，朕之志為何如哉。賴天之靈，建業一定之後，軍民表裏一厥心志，旌旗所指，強滅弱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順天愛民者，悉從我遊，獨念河東魁帥，擁眾北奔，比之關中諸人，稍為崛強。然其順天愛民，一筭之長，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餘，有若孤狔，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詔使命邇來。乃今交趾、占城，萬里來貢，高麗稱藩航海久至，盧龍戍卒及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遊遼瀋。朕聞爾總其眾，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行人之還，略不得其要領，豈以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未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以曩時之歸，未盡賓主之歡，心有所愧，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忘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為遼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幾，毋為後悔，故茲詔示，想宜知悉。</p>	<p>曩因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群雄角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眾，從淮渡江，姑孰之捷，爾實在焉。時朕未知天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賴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順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眾北奔，比之關中諸人，稍為崛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筭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餘，有若孤屯，故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詔使者相望。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庭，於是盧龍戍卒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造遼瀋。朕聞爾總其眾，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略不得其要領，豈以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以曩時來歸，未盡賓主之歡，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忘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為遼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幾，毋貽後悔。</p>

⁹¹ 同上注，〈命右軍左都督甯政等鎮雲南詔〉，頁三十上。

⁹² 此外，尚有〈諭福建承宣布政司參政魏鑑瞿莊詔〉於《明太祖實錄》只作：「今年仲夏敕卿南行以轄八閩，然其地利盡南海，勢控諸番，宜忠君愛民，脩身慎法，則芳名不朽。卿其審釋力行以副朕委任之意。」見《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一〈諭福建承宣布政司參政魏鑑瞿莊詔〉，頁二六上至二六下；《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八，洪武九年八月是月條，頁1802。

⁹³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二，頁三下至四下；《明太祖實錄》，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丁巳條，頁1030-31。

雖然兩書所載大體相同，但文句如何刪減剪裁，有目共睹。不少地方雖為文字修飾，無傷大雅，但將「爾與張御史之歸」整句刪去，便與原意相違。蓋因明太祖於至正十五年(1355)釋納哈出北歸時，將「張御史」一同縱歸。⁹⁴故《御製集》原詔云「爾與張御史之歸」，即是提醒納哈出被縱歸的恩情，這樣便使得整個詔令的態度有所不同。

無獨有偶，將洪武四年(1371)二月的〈諭遼東詔〉與《明太祖實錄》對照，⁹⁵又發現實錄刪減了「僉院楊允賢」一句。洪武元年(1368)的〈立南北京詔〉除了字詞更動外，更有「民物有助於朕，其可忘乎？頃幸大梁，詢及父老，皆曰昔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天下咸服」一段為實錄刪除，雖然改動並無礙文意，但卻埋沒了不少訊息。⁹⁶以上示例足以證明《御製集》所輯的詔令文書，不少應為《明太祖實錄》纂修前的原件，因此《御製集》對於研究洪武朝史實有極為重要的價值。⁹⁷

此外，《御製集》中詔令的史料價值，不單從與《明太祖實錄》的對比可以彰顯，若將它與諸本《御製文集》對比，則更能突顯其作為太祖文集獨一無二的價值。這方面可從三例說明：(一)《御製集》的〈即位詔〉載有「以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⁹⁸乃諸本《御製文集》所缺，⁹⁹對照《明太祖實錄》則有類似記述；¹⁰⁰(二)《御製集》的〈求言詔〉末，在「又非賢人君子」後有「故茲詔諭，想宜知悉」。這兩句屢見於各種詔令，應是頒行詔令的格式，但諸本《御製文集》均不載；¹⁰¹(三)《御製集》所收〈諭雲南詔(二)〉有兩處異於諸本《御製文集》。其一，《御製集》提及雲南王名諱是「伯資刺瓦兒迷」，但《御製文集》只記「雲南王某」；其二，《御製集》中有「王

⁹⁴ 《明太祖實錄》，卷三，乙未歲十二月壬子條，頁38-39。

⁹⁵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二，頁三一下至三二上；《明太祖實錄》，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條，頁1192-93。

⁹⁶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一〈立南北京詔〉，頁二下至三上；《明太祖實錄》，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條，頁599。

⁹⁷ 筆者在2015年1月9-10日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近代史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所主辦的「明清史：史料與課題研討會」上發表〈《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中的「制」、「檄」、「賜書」探微〉一文，討論到《御製集》的〈諭中原檄〉與今所流通版本不同，當中提及「漢人類中，當降生聖人」而非實錄的「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循此方向或可掌握太祖開國民族革命的性質。

⁹⁸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一，頁一下。

⁹⁹ 《明太祖御製文集》，卷一，頁38；《高皇帝御製文集》，卷一，頁一下；《明太祖集》，頁2；《明太祖文集》，卷一，頁2。

¹⁰⁰ 實錄載：「立妃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見《明太祖實錄》，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丙子條，頁482-83。

¹⁰¹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二，頁十二下至十三上；《明太祖御製文集》，卷一，頁40-41；《高皇帝御製文集》，卷一，頁二下至三上；《明太祖集》，頁3；《明太祖文集》，卷一，頁2。

當換寶，臣當換印。令爾王臣享福於彼」，但不見於《御製文集》。若與《明太祖實錄》對照，則可見《御製集》與實錄記述吻合。¹⁰² 凡此種種均證明《御製集》的詔令比《御製文集》更為完備可信。

最後，從編目上已知《御製集》在研究太祖文學的價值上遠勝《御製文集》。若再對比朱彝尊(1629–1709)《明詩綜》所收集的〈神鳳操〉、〈鍾山賡吳沉韻〉、〈春望牛首〉三首，¹⁰³ 則亦見載於《御製集》。故此可以斷言，《御製集》是現存收錄最多明太祖文學作品的書，這書獨特的史料價值並不是他本所可以取代的。¹⁰⁴ 眾多的詩、歌、賦、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及各種排律、律詩等作品，是瞭解太祖文學修為的一手史料，以下舉例說明。

洪武十三年(1380)四月，太祖賜翰林應奉陳溥還鄉並賜御製詩文，¹⁰⁵ 唯實錄不載詩文，反而《御製集》有〈賜翰林應奉陳溥歸〉，¹⁰⁶ 因此追溯對比不同題材詩文及時間、場景，或有可能找到史料作進一步研究。這些文學作品亦可用於分析太祖的生活，諸如《御製集》輯有〈賜高僧饌〉、〈續賜僧宗泐〉、〈賜僧弘道〉、〈諭僧集景吟題〉、〈隨庵和尚住靈谷寺〉、〈賜首僧清濬住靈谷寺〉等等大量太祖與僧俗的詩文，都有助於我們瞭解太祖與僧侶、佛寺之間的關係。此外，尚有〈古辭賜耆儒鄭子夔歸江西〉、〈古辭賜賢士潘浚歸廣東〉及〈和王佐與安南回使黃天祐韻〉、〈和王佐與安南黎統兵詩韻〉等等，雖然詩文內容所涉有限，但單從題名已見太祖與儒士甚至安南使臣的往來關係。近千文學作品不單是瞭解太祖文學的珍貴材料，也是瞭解太祖生活、思想等方面的重要佐證。

雖然，整體上《御製集》有不容忽視的史料價值，但在使用時有一點應加注意，即《御製集》有時難以查證。當缺乏其他史料佐證，若《御製集》與《御製文集》出現差異，便難以分辨彼此對錯。以〈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為例，《御製集》云：「凡受試者，當此之際，事役其形，財惑其志，欲動其心，其於孝親忠君，立身保命，雖千百人中，欲求一士如斯者鮮矣。」¹⁰⁷ 但諸本《御製文集》所載的不是「立身」而是「律

¹⁰² 實錄將雲南王名諱記為「把匝刺瓦爾密」，與《御製集》所記的音譯接近。至於「王當換寶，臣當換印。令爾王臣享福於彼」，則改為「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群下皆仍舊官，享福於彼」。見《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二，頁二下至二四上；《明太祖實錄》，卷九二，洪武七年八月戊戌條，頁1608–9；《明太祖御製文集》，卷二，頁76–77；《高皇帝御製文集》，卷二，頁九下至十上；《明太祖集》，頁24–25；《明太祖文集》，卷二，頁14–15。

¹⁰³ 朱彝尊：《明詩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一，頁175–76。

¹⁰⁴ 胡士尊指萬曆本《御製文集》輯錄了《御製文集》甲、乙、丙、丁、御製詩集的三十卷，為《御製文集》中最完備的版本。至於《御製集》，則輯錄大量萬曆本不收的文學作品。見胡士尊：〈點校後記〉，頁477–78。

¹⁰⁵ 《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四月癸酉條，頁2077。

¹⁰⁶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十八〈賜翰林應奉陳溥歸〉，頁十九下。

¹⁰⁷ 同上注，卷一，頁二八上至二八下。

身」。¹⁰⁸因實錄未見此詔，難以對照《御製集》與《御製文集》孰是孰非。可見缺乏他證時，《御製集》的使用會受到一定的掣肘。

結 論

總結而言，《御製集》雖然與《御製文集》同源，但隨著永樂、嘉靖、萬曆三朝對於《御製文集》的重新謄錄和編集，使得版本出現各異，從而形成了「御製集」一類，有別於「御製文集」。歷來由於對《御製集》缺乏認識，忽略了它的價值。本文利用《明實錄》及《內閣藏書目錄》等史料爬梳源流，推論今本《御製集》應於嘉靖時期奠定格局，其所輯詔令、文書、詩文等種類及範圍，遠超諸本《御製文集》以及其他各種明代詔令彙編，因此有保存明初史料的重要價值。再者，從其輯錄的各種詔令，皆見原始性甚高。這些詔令或為《明太祖實錄》纂修所據的原件，可以用作與《明太祖實錄》對勘。因此，對《御製集》作全面的整理校勘，應可成為我們重新認識洪武朝的重要契機。

¹⁰⁸ 《明太祖御製文集》，卷二，頁65；《高皇帝御製文集》，卷二，頁四上；《明太祖集》，頁17；《明太祖文集》，卷二，頁10–13。

The *Da Ming Taizu huangdi yuzhiji*: An Overlooked Collec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s of Ming Taizu

(Abstract)

Kwok Ka Fai

The collected works by the Ming founding emperor is a magnet for historians' attention, as they are important primary sources to understand Ming Taizu and his times, especially when almost all other records of his rule had been banned or destroyed by his descendants. Apart from several editions of the *Ming Taizu yuzhi wenji*, there is an overlooked collection entitled *Da Ming Taizu huangdi yuzhiji* that contains unexplored materials not found in all other sour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Yuzhiji* by comparing it with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Yuzhi wenji* regarding three aspects, namely, its wider range of works collected, those edicts collected in the form of original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those essays exclusively collected in the *Yuzhiji*. It aims at showing the importance of re-examining the *Yuzhiji* so as to discover hidden facts of the Hongwu era.

關鍵詞： 明太祖 文集 史料 詔令 文學

Keywords: Ming Taizu literary collection primary source imperial edict literature